

論狄托事件

正大出版社印行

# 論狄托事件

編著者 張達生

發行者 正大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民國卅七年八月一日初版

版權  
所有

## 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

保加利亞工人黨（共產黨），羅馬尼亞工人黨，匈牙利勞工黨，波蘭工人黨，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法國共產黨，捷克斯拉夫共產黨及意大利共產黨之代表所參加的情報局會議，討論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狀況問題，並認定南斯拉夫共產黨代表已拒絕出席此次情報局會議的這一事實之後，一致通過下列各項結論：

一、情報局指出：南共領導機關最近時期在對內和對外政策之基本問題上，執行着一種放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錯誤路線。因此，情報局贊同蘇聯共產黨（布）中央首先揭露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特別是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等同志的政策行動。

二、情報局確認：南共領導機關對蘇聯和對蘇聯共產黨（布）進行着非友好的政策。在南斯拉夫，放任詭譎蘇聯軍事專家及謾罵蘇軍，而聽其發展的可恥政策。對於在南斯拉夫的蘇聯非軍事人員，創立了一種專門制度，由於這種制度，他們曾被置於南斯拉夫國家保衛機關監視之下，他們底行動並受到保衛局人員的釘梢。駐情報局之蘇聯共產黨（布）代表尤金及駐南斯拉夫之蘇聯許多官方代表，都遭受了南斯拉夫國家保衛機關這種同樣的監視和釘梢。

這些事實及其同類事實證明：南共領導者抱着一種共產黨員不應有的立場，由於這種立場，

南共領導者開始把蘇聯的對外政策和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等同起來，以對待資產階級國家的態度對待蘇聯。正是由於這種反蘇態度，從反革命的杜洛茨基武庫中竊取來的關於蘇聯共產黨（布）脫化、蘇聯脫化及其類似的誹謗宣傳，在南共中央才得到了散布。

情報局斥責南共領導者這種反蘇的趨向，認為這種反蘇趨向，是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不相容的，只是適合民族主義的立場。

三、在對內政策上，南共領導者放棄了工人階級的立場，叛變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他們否認國內資本主義成份的增長，和由此而產生的階級鬥爭在南斯拉夫農村中加劇的事實。這種否認是從機會主義的觀點出發的，以為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階級鬥爭不會尖銳化，如像馬列主義所教導我們的那樣；而是階級鬥爭的逐漸削弱，如像布哈林式的機會主義者所鼓吹的資本主義和平成長為社會主義的「理論」一樣。

南斯拉夫領導者在農村中也執行着一種錯誤政策，忽視農村的階級分化，把個體農民看成是一個沒有區別的整體，違背馬克思，列寧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反列寧的著名論證：小的個體經濟每日、每時、不斷地、自發地、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可是，南斯拉夫農村中的政治狀況，並沒有任何能令人自安自慰和高枕無憂的根據。當小的個體農民經濟在南斯拉夫佔着優勢——土地國有並未實現，土地私有繼續存在，土地買賣自由，富農集中大部土地財產於其自己手中並雇用雇傭勞動者等——的情況下，以調和階級鬥爭和取消階級矛盾的精神去教育黨，其結果只有使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面前解除武裝。

南共領導者堅信「農民是南斯拉夫國家的最堅固的基礎」，因此在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的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道路，而走向民粹主義的和富農的黨的道路上去。列

寧教育我們說：「無產階級是近代社會唯一的革命到底的階級……在全體人民爭取澈底的民主革命鬥爭中，在一切勞動者、被剝削者反對壓迫者與剝削者的鬥爭中，他們應當成爲領導者和領袖。」

南共領導者違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這個理論。

至於談到農民，那麼農民的大多數，也就是貧農和中農，能夠和工人階級結成聯盟，或者已結成聯盟，而這個聯盟中的領導者應當是工人階級。

上述的南共領導者的立場，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這個原則的。

很明顯的，這個立場表現出來的觀點，是適合於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觀點，而不是馬列主義的觀點。

四、情報局認爲南共領導機關修改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黨的理論。根據馬列主義理論，黨是國家基本領導力量，有自己的一定的政綱，而不是溶化在非黨羣衆組織中。黨是工人階級之最高組織形式和最重要的隊伍，可是在南斯拉夫，認爲國內基本領導力量不是共產黨，而是人民陣線。南共領導者降低共產黨的作用，實際上是使黨溶化在非黨的人民陣線中，這個非黨人民陣線包括着從階級觀點看極不相同的各種分子（工人、農民、從事個體經濟的勞動農民、富農、商人、小企業主、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等），而且同樣還包括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別，也包括着某些資產階級的黨派。南斯拉夫領導者固執的不願承認自己立場的錯誤，認爲南共不能有和不應有自己獨特的政綱，而應以人民陣線的政綱爲滿足。

在南斯拉夫政治舞台上活動的真是人民陣線，而共產黨及其組織不是以爲己的名義在人民面前公開活動，這一事實不僅降低着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上的作用，而且使黨喪失其成爲獨立的政治

力量，使其不能經過公開的政治活動，經過公開宣傳自己的觀點和自己的政綱，日益取得人民更大的信任，並更加擴大自己對廣大勞動羣衆的影響。南共領導者重複着俄國孟什維主義者的錯誤，即馬克思主義黨溶化於非黨羣衆組織中的錯誤。這一切證明着，在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問題上，存在着取消派的傾向。

情報局認爲這種政策危害到南共本身的生存，其結果將有使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蜕化的危險。

五、情報局認爲南斯拉夫領導者製造成的黨內的官僚主義制度是南共生存和發展的致命危險。黨內沒有民主，黨的領導機構，沒有選舉，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與鐵托同志和卡德爾同志做過的許多次沒有根據的聲明相反，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的大多數委員不是選舉的，而是推薦的。共產黨實際上處於非法的地位。黨不召集黨的會議或者是採取秘密方式召集，這不能不損害黨在羣衆中的影響。南共的這種組織形式，只能稱之爲宗派主義式的官僚主義式的形式。這種形式走向取消黨之成爲一個積極的獨立的有機體，在黨內養成軍事領導方法，就像從前托洛茨基所主張的領導方法一樣。

完全不能忍受的是，在南共黨內，黨員之持起碼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對黨內不正確的事情稍加批評，即遭受到嚴厲的懲罰。

情報局認爲，南共中央委員尤約維奇（按：尤氏於一九四七年九月南斯拉夫民族陣線第二屆代表大會上被選爲民族陣線總書記）和海勃朗兩同志，因爲敢於批評南共領導者們的反蘇傾向，和主張南斯拉夫與蘇聯友好，而被開除黨籍並被逮捕的事實，是可恥的。

情報局認爲在共產黨內決不容忍這種卑鄙的、純粹專制的、恐怖主義的制度。爲了南共本身

的存在和發展，必須結束這種制度。

六、情報局認爲：蘇聯共產黨中央及其他各國共產黨中央對南共中央所犯錯誤之批評，乃是一種兄弟的幫助，這些批評給予南共領導機關造成一切必要條件，以便最迅速地改正他們所犯的錯誤。但是，染上了極端高傲、自滿、目空一切等毛病的南共領導者，不去誠懇地接受這些批評，不去以布爾塞維克改正錯誤的態度，去改正所犯的錯誤，却以敵意和仇視的態度對待批評，走上了一概否認自己錯誤的反黨道路，違背了馬列主義關於政黨對待自己錯誤的態度的理論，因此更加重了自己底反黨的錯誤。

南斯拉夫領導者，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及其他兄弟共產黨中央方面的批評面前，沒有理由可以辯護，即開始直接欺騙自己的黨和人民，把這種對南共中央錯誤政策的批評向黨隱瞞，並且對黨和人民掩蓋懲罰尤約維奇及海勃朗兩同志之真實原因。

最近以來，在蘇聯共產黨中央以及其他各兄弟黨中央方面對南斯拉夫領導者所犯錯誤進行了批評之後，南斯拉夫領導者乃趕快設法制定一系列新的左的措施。南共領導者慌忙頒佈了關於小工商業國有化的新法律，這一法律之施行是毫無準備的，並由於這種匆忙的原因，這一法律的施行只能使南國人民的生計發生困難。他們慌忙頒佈了徵收農民小麥稅的新法律，這一法律也是無準備的，因此新法律也只能使城市居民的小麥供給發生困難。最後，南斯拉夫領導者，在不久前，出於意外地，用喧囂的言辭宣佈自己對蘇聯的親切友愛，雖然誰都知道他們至今還在實行對蘇聯的不友好政策。

但不僅如此，最近期間南共領導者十分自信地宣佈在南斯拉夫剷除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在鐵托和卡德爾於今年四月十三日致蘇聯共產黨中央的信中寫道：「中央全體會議同意了中央政治

局所提出之在國內肅清資本主義殘餘的方案」。

按照這一觀點，四月廿五日卡德爾在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聯邦國民議會上的演辭中宣稱：「人剝削人的一切殘餘，在我國存留的時間已屈指可數了」。

南共領導者之在南斯拉夫現存條件下消滅資本主義成份，也就是消滅富農階級的觀點只能是冒險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而絕不能是別的東西。因為，當不可避免地產生資本主義的個體農民經濟在國內佔着優勢，當農村經濟大規模集體化的條件尚未具備、當多數勞動人民還未相信農業經營的集體方法的優越性時，是絕不能解決這一任務的。蘇聯共產黨的經驗證明：只有在農村經濟大規模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最後的數目最多的剝削階級——富農階級，才有可能；而消滅富農之為階級，乃是農村經濟集體化的有機的構成部份。

為了順利進行消滅富農之為階級，因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要求黨長期進行初步的準備工作來限制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鞏固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人階級與農民生產聯盟，發展為組織集體經營農業所必需的機器生產的社會主義大工業，在這一工作中的急性病只能帶來不可挽救的損害。

只有在周密準備及徹底實行這些措施的基礎上，由限制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因素而轉到消滅它們，才有可能。

南斯拉夫底領導者以慌張手段和官僚主義的法令來解決這一任務的一切企圖，只是註定了要失敗的冒險，或者只是一種毫無根據的煽惑人民的吹牛而已。

情報局認為：南斯拉夫領導者利用同樣錯誤的和煽惑性的策略，來表示他們不僅站在階級鬥爭立場上，而且大大超出了那些由現實可能性觀點來看南共在限制資本主義方面所能作到的那些



要求。

情報局認爲：南斯拉夫領導者的所有這些左傾的法令和宣言，都是煽惑性的和目前不能實現的，它們只能損害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

所以情報局認爲這些冒險策略乃是一種卑鄙的手腕，和不能允許的政治賭博。

顯然，上述南斯拉夫領導者底左傾的煽惑的措施和宣言，乃是企圖掩蓋其拒絕承認錯誤和掩蓋其拒絕誠懇改正自己的錯誤的。

七、鑒於南共黨內造成的這種情況，並力謀爲南共領導者指出一條出路起見，蘇聯共產黨中央和其他兄弟黨中央曾提議根據在第一次情報局會議上審查其他共產黨活動的一般的黨底原則，同樣來審查南共狀況的問題。可是南共領導者對其他兄弟黨在情報局上討論南共狀況問題的數次提議，都加以拒絕。爲了逃避在情報局會議上兄弟黨的正當批評，南共領導者杜撰出似乎他們是「處於不平等地位」的說法。應該指出：這種說法完全不是事實。大家都知道，在組織情報局的時候，共產黨正是由這樣的一個原則出發的，即任何一個黨應該向情報局報告工作，同樣任何一個黨有權批評其他的黨。在九國共產黨第一次會議上，南共曾廣泛地使用了批評其他的黨的權利。但是南共領導者却拒絕向情報局報告工作。拒絕傾聽其他共產黨底批評意見，這就是說明南共領導者事實上自己破壞了各國共產黨平等的原則，這就等於要求給南共在情報局裏建立特殊的地位。

八、鑒於上述一切事實，情報局全部贊同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對南共內部狀況的估計，對南共中央錯誤的批評，以及蘇聯共產黨（布）中央於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五月致南共中央迭次信件中對這些錯誤的政治分析。

情報局一致得出結論：認爲南共領導者反馬列主義的、反黨的、反蘇的觀點，其一切行爲及其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這就是使自己與參加情報局的各國共產黨對立起來，走上了分裂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線的道路，走上了叛變勞動者底國際團結事業及轉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

情報局斥責南共中央底這種反黨的政策和態度。

情報局認爲：這樣，南共中央便使自己及南共處於自己兄弟黨的大家庭之外，處於統一的共產主義陣線之外，因此處於情報局隊伍之外。

X  
X  
X  
X

情報局認爲南共領導機關這些錯誤的根源，乃是一種無可懷疑的事實，即：在南共領導機關裏，於最近五、六個月以來，那些以前曾隱藏着的民族主義分子公開取得了優勢，而使南共底領導機關脫離了南共國際主義的傳統，走向了民族主義的道路。

南斯拉夫領導者過高估計了南斯拉夫內部的民族力量及其潛在能力。他們以爲沒有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的支援，沒有人民民主國家的支援，沒有蘇聯底支援，就可以保持得住南斯拉夫底獨立，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他們以爲沒有革命力量底援助，新南斯拉夫也可以生存下去。

南斯拉夫領導者不了解國際情況及爲帝國主義者們底嚇詐所嚇倒，以爲向帝國主義國家作某些讓步，他們就可以博得這些國家的歡心，就可以與這些國家談好保持南國底獨立，這樣便逐漸促使南斯拉夫各民族傾向於帝國主義國家，也就是說傾向於資本主義。在這一點上，南共底領導者巧妙地接受了著名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底觀點，即：「資本主義國家對南斯拉夫獨立的危險，比蘇聯對南斯拉夫的獨立的危險還要少一些」。

南共領導者顯然是不瞭解，或者是假裝不了解。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不能不使南斯拉夫蛻化爲一般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底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國家底殖民地。

情報局並不懷疑在南共內部是具有忠實於馬列主義的，忠實於南共國際主義傳統的，忠實於統一的社會主義陣線的健全的力量。

南共這些健全的力量底任務，就是要強迫今天的領導者公開地誠懇地承認自己底錯誤，改正這些錯誤，脫離民族主義，回到國際主義方面來，並以一切辦法鞏固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線；或者，如果南共現在的領導者表現得沒有這種能力，那就換掉他們，並推選新的國際主義的南共領導機關。

情報局不懷疑南斯拉夫共產黨是能夠完成這一光榮的任務的。（譯自巴黎「人道報」）

## 關於南斯拉夫共黨問題

# 中共決議的全文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完全同意由保羅匈波蘇法捷義各國共產黨所參加的情報局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所通過的決議。舉行這個會議，並通過這個決議，乃是國際共產主義者爲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保衛世界工人階級和各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所應盡的職責，乃是他們爲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

○以狄托、卡台爾、吉拉斯、蘭考維治爲代表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集團，在其對內對外的背叛性的和錯誤的行動中，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例如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則區別，國際援助對於各國革命運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對於人民革命事業的領導作用，黨是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黨的民主集中及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用等，從而陷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泥坑，狄托集團因爲它執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內外政策，因爲它採取了反蘇立場，壓制黨內批評，拒絕蘇聯共產黨其他五共產黨的兄弟批評，拒絕參加情報局會議，並在情報局會議的決議公布以後，繼續壓制南斯拉夫黨內外的正確意見，繼續敵視國際共產主義，已經嚴重地損害了南斯拉夫的人民事業，並使南斯拉夫的敵人歡呼。中國共產黨熱烈希望南斯拉夫共產黨內的國際主義份子能夠堅決地起來糾正狄托集團的錯

誤，使南斯拉夫共產黨從新走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走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軌道。

③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南斯拉夫黨內所發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現象，這是階級鬥爭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中的反映。只要是階級存在的國家，帶着資產階級反革命觀點的投機份子，總是企圖混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混入共產黨，企圖利用機會，從內部來破壞革命的投機。這種情況曾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多次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內，則曾經表現為陳獨秀主義和張國燾主義。這種情況，要求共產黨人努力提高覺悟，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教育，以便及時地識別和反對這些資產階級份子，保衛無產階級和人民的事業不受破壞和損失，保衛共產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純潔。

爲此目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全黨幹部都應當認真研究共產黨情報局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藉以加強黨內關於階級的、黨的、國際主義的自我批評精神和紀律性的教育。

（轉載七月廿三日上海「大公報」）

# 論自我批評

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人民，正以極大的熱情來建設他們歷史上第一次的自由生活。他們以勞動和主動的創造來發展與鞏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基礎，從而加強人民民主事業的力量。

新民主主義各國在共產黨，和工人黨——工人階級的真正而受過考驗的先鋒隊——領導之下的經濟和政治的成就，是不易得來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在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況下發展着，而這種階級鬥爭，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因此，向着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並不是平滑沒有鬥爭，沒有困難和錯誤的。

自我批評是一種有助於揭露和消滅缺點和錯誤的銳利武器。

批評與自我批評使我們易於攻擊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的敵人，暴露他們的陰謀，幫助及時消滅錯誤，因而給新的成功開闢了一條道路。

列寧和斯大林同志教育我們，當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黨當權的時候，自我批評是特別需要的，因為執政黨的成員，每每因為成功而自滿，看不到自己的弱點，因而使敵人的破壞工作。

因此批評與自我批評，對於爲了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的穩重發展的鬥爭，對於爲了改進及提高一切思想意識，政治和組織工作的品質的鬥爭，是有着重要意義的。

自我批評不單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在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武庫中，批評與自我批評是與馬克思

——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偉大主義不可分離的永遠活躍的武器。自我批評是黨的發展的規律，是一種以革命發展的精神來教育黨的幹部、工人階級和人民的特殊方法。

在黨的組織中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就不能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織原則，不能加強黨的組織和它與羣衆的聯系，也不能用正確的馬列主義方法來教育黨的幹部。

在黨的會議上有權批評黨的任何負責同志，是黨內民主原則的一部份；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自由，使黨員能更容易行使對黨的領導者的控制力。

斯大林同志說，作爲布爾塞維克，不能不知道自我批評的口號是我黨活動的基礎，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布爾塞維克教育幹部的精神。

斯大林同志的這些話，把自我批評在黨內生活中是應該當作一種經常工作的作用與位置，更清楚的澈底的確定了。

不用選舉的方法產生黨的領導機關，而只由上級指定，這樣就不可能說黨內有民主，更不能說是有批評和自我批評；在這樣的組織中，黨員就不大願意發表他們的意見，因爲害怕報復而避免批評黨內現存的秩序。

沒有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沒有吸引廣大勞動羣衆參加暴露和改變弱點和缺點，是不可能走向社會主義的。這就是爲什麼應該鼓勵工人羣衆，勞動農民和進步的知識份子進行批評，由下而上行使控制權的理由。驕傲自滿往往產生一種對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有時因爲不了解自我批評是黨的一個主要的工作方法，也會產生限制批評的思想，使它窒息，並採取手段來對付作嚴重批評的人。

一種對批評的不正確看法，表現在不承認和改正錯誤，而主觀地視批評當作對個別領導人，

組織的領導人等威信的冒犯，當作對領導者的雄心和聲望的侮辱。這種態度不可能加強黨的組織，也不可能促進幹部的正確的教育。相反地它對黨的生活與發展是極端有害的。誠懇和坦白地承認錯誤，並採取步驟來克服這種錯誤，才能夠加強黨的組織，以自我批評進行工作的精神來教育幹部，磨銳他們的警覺性，使黨的整個內部工作注入新的力量和生命。

在這方面，法國和意大利黨底領袖們可作優良的模範。在去年九月在波蘭舉行的九國共產黨情報局會議上，他們以馬列主義者的態度承認了錯誤，接受了對於形成錯誤的自己的缺點的嚴厲批評。在他們的報告中——報上已發表——杜克洛（Duclos）和龍哥（Longo）同志很詳細地說明了這些錯誤。在廣大的黨員面前批評了自己的缺點，法國和意大利的黨採取了必要步驟來克服這些錯誤，這樣做，他們加強了他們陣營的團結，對於以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精神正確地教育幹部的工作，有了寶貴的貢獻。

列寧說：『迄今為止一切革命政黨之陷於滅亡，是因為他們自驕自大，看不見自己力量何在，而且怕說自己的弱點』。誰堅持拒絕承認自己的錯誤，在人家稱頌的迷霧中，沾沾自喜，看不到工作中的嚴重錯誤，誰就忘却了列寧這一個重要指示。

自我批評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黨的一種弱的表示，而是一種強的表示。因為只有一個強大的黨，它生根於生活中而又向勝利邁進，它便不怕它的黨員以及人民大眾對它的缺點無情地批評。『只有生活在過去中的，命定死亡的黨，才害怕批評的光輝。我們不害怕這些，因為我們底黨是一個向上升的，朝着勝利邁進的黨。這說明批評……在我們黨中是力量的表示，是加強黨而不是剝削黨的手段。』——斯大林。

只有資產階級的黨派，他們掩蓋真理，遮掩自己的缺點，裝作什麼都好。只有那些歷史上已



決定死亡的黨派，才會害怕日光和批評。爲什麼呢？因爲資產階級的黨，只要他們有一點點的嚴肅自我批評，有一小點點對自己缺點批評的自由，那麼在資產階級的秩序中的任何微小的黑暗，都將被揭露出來。

馬克思主義的黨，在鼓勵羣衆向它作有效的基本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在它傾聽羣衆的呼聲的能力中，看到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進一步加強黨與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和全體人民聯系的有力武器。

廣泛的在原則基礎上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用過去的錯誤教育幹部，總結積極的工作經驗，馬克思主義的黨就會在這樣做法下進一步加強自己的隊伍，把勞動人民團結在它的週圍，向着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新的勝利的鬥爭之途邁進。

（譯自「爲持久和平，爲人民民主」）

# 論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

斯列波夫作  
亞天貳譯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說，原則性的政策是惟一正確的政策。我們的黨不能容忍有絲毫的不穩定性與無原則性的表現，要求我們工作人員能經常不打折扣的完成自己的任務，經常站在政治活動家的崗位。

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就是對一切稍微脫離黨的原則思想和政策的傾向之不可調和的精神。黨的政策是蘇維埃制度之生命的源泉，黨的工作者在自己一切大小工作中應以黨的政策為行動指南，從政治的原則性的路線出發。

列寧教導我們說，政治是從聯繫到千百萬人民利益的事情出發，是原則地從政治上去對待問題。就是說，要從千百萬人及他們之間相互關係的觀點來觀察問題，這就不能在本位主義的，地方性的，朋友關係等利益面前作絲毫的讓步。布爾什維克重視友情、同志關係，但是他認為評定一個人行為的最高標準，是看這個人如何對待由蘇維埃國家所代表的人民利益。

列寧寫道：「我們承認同志間的義務，承認有援助一切同志的義務，承認有耐心聽取同志意見的義務，但對我們來說，同志間的義務是從對俄國的和世界社會民主黨的義務產生出來的，不能把他顛倒過來」（列寧全集二卷五四一——五四二頁）。

由此可見，在原則性的精神上教育幹部，這就是說，必須作到在決定任何問題時，幹部不是從私人的或地方的利益出發，而是從國家的利益出發，在一切場合堅持這種利益，並與反國家的

傾向作鬥爭。每個工作人員底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表現在他對自己所擔負的工作之態度上。而檢查他的原則性，就看他是否把自己的工作服從於國家當地的重大政治任務，評定一切措施的標準，是這些措施是鞏固還是削弱我們的偉大事業，促進這件偉大事業的繼續發展還是妨礙其發展。這一點也應作為測量一切工作人員之布爾什維克原則性的標準。

現實在證明着，不善於正確判斷各種現象和不善於有原則地對待問題，會受到嚴重的損失。拿「星」及「列寧格勒」兩雜誌編輯部所犯的錯誤為例來說——這些錯誤被聯共中央及時地揭發了。這些雜誌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領導工作人員不是把正確的報導蘇聯人民和政治上所導文學工作者的活動的利益作為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而是以私人的，朋友的——就是說，庸俗的利益為其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由於他們不願意破裂朋友的關係，所以他們對沒有價值的，反藝術的，脫離政治的作品不加批評。由於他們害怕得罪朋友，便登載了非常不適當的作品，聯共中央的決議裏說道，這種自由主義把人民的和國家的利益正確教育我們青年的利益作了朋友關係的犧牲品，它閉塞了批評，結果是作家們停止繼續深造，喪失他們對人民對國家與對黨的責任感，他們也就停止前進了。或者我們再拿對外國阿諛逢迎的事實來看一看，很顯然，我們一部份落後的知識份子還沒有擺脫這個可恥的毛病。他們卑躬屈節地與事實謀妥協，這還不是無原則的表現嗎？這說明需要在一切問題上表現原則性，在黨的工作中尤其必要。從政治上處理問題的態度——是黨的工作中的基本態度。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黨的生活與黨的工作之基礎，不在於黨在當時所採取的或能以採用的那一些組織形式，而在於黨的政綱與黨的對內和對外的政策」（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四一九頁）。這就是說，我們的工作人員應當不僅是好的組織者，熟練的實際工作者，而且也是政治上成熟、

### 思想上堅定的人

深刻的思想，對馬列主義偉大思想之正確性的堅定的信念，便是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之基礎。只有在原則上堅定不移，很好的掌握了馬列主義的思想的人，才能具有戰鬥的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才能從黨的原則立場，去對待問題。

馬列主義的理論給予幹部以光明的前途，使他們在工作中具有信心。這種理論發展他們的才能，使其能從小的事情看到大的事情，能從日常的眼前的工作中感覺到是在爲了偉大的理想而鬥爭。反之，對理論上不關心的態度，便會使其失掉前途。論到不關心理論的人們時，斯大林同志說過，他們有從政治活動家變成爲政治上的庸人，變成無原則的脫離政治的事務主義者。

斯大林同志說：「關於這種游離不定的人們，偉大的俄國作家果戈里，曾頗中肯地講過：『那些沒有定見的人物是既非此又非彼，反正你不能理解他們是些什麼人，簡直是非驢非馬！』」（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六九〇頁）

**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乃是在思想上原則性上教育我們幹部的的方法，同時也是提高他們戰鬥力的最重要方法。偉大馬列主義的思想乃是我們幹部精神力量之活的源泉，是幹部之堅決性及其在克服困難中之不枯竭的精力之活的源泉。實際的經驗在在都證明着思想開展的人們，在實踐中也是有力量的。他們在工作中，有更大的信心，暫時的失敗不能使他們灰心，他們堅強地向既定的目標前進。正因爲如此，黨便要求我們的幹部有系統的努力地進行自我學習，以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

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是一種對一切缺點的不能容忍性。它是在高度嚴肅性的情況中養成的，關於以原則性的精神教育幹部，儘管高談闊論，但如果黨的委員會不表現足夠的嚴肅性，姑息地

對待工作人員的錯誤，那麼便會給布爾什維克的幹部教育招致嚴重的危害，比如，在伏羅希洛夫格勒省黨委中就存在「這種實際情況，不久以前，國家計劃局的代表揭發了「克拉斯那提煤礦」托拉斯和「卡堂也夫煤礦」托拉斯兩企業中多報礦井中探煤量的事實，他將這些通知了聯共省黨的領導同志，據估計將會加以處理。但省黨委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原則性，沒有注意兩企業中領導者違反國家利益的行動，沒有使他們受到處分。

作一個有原則性的人，就是說，不怕得罪任何人而面爽地誠懇的指出他們的缺點，領導者應當善於「用布爾什維克所固有的那種全部直爽態度發表自己的意見……」，「像布爾什維克那樣明白而公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問題十一版三九八頁—四四頁），同時有原則性的人他本身也不怕勇敢的坦白的答覆的批評。

批評乃是布爾什維克幹部教育方法的靈魂，在對批評的態度上，也可以檢驗一個工作人員底原則性。一個工作人員不能把布爾什維克的有益的批評看作是對自己的侮辱，看作是對自己的威信的損害，因而應把自尊心看得高於工作的利益，他應當有勇氣批評別人，也善於勇敢地接受批評。

△「任何一個組織，沒有批評的話，都會腐朽的。沒有批評則任何毛病可以深入膏肓，較難治療。只有大胆的公開的批評才能幫助人們變得日益完善，才能促起人們前進，克服工作中的缺點，凡是沒有批評的地方，那裏便從根本上腐爛發霉，停止不前，那裏便沒有可能前進」（日丹諾夫）。

可惜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如此的抱着不能容忍的態度，竟以報復所謂「欺侮者」相威脅，而且竟然實際的就作了。可舉這樣一件事實為例，黨員伊萬年科同志曾同其他一些同志正確批評了莫

斯科——庫爾斯克鐵路配車處的工作中的一些嚴重的缺點和該處處長斯米爾諾夫同志，斯米爾諾夫不去傾聽批評與按照布爾什維克的精神改正工作中嚴重缺點，反而把伊萬年科同志的工作撤掉了，甚至當伊萬年科奉部令恢復了工作之後，斯米爾諾夫却硬降低了她的工作職位，按她的專門技術，本是工程師，現在却要她當統計員。奇怪的是，鐵路局黨的組織的領導者們對此熟視無睹，事實上是在助長斯米爾諾夫同志的不正確的行動。

不能容許這一種用處理事務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的情況之存在。沒有批評，不能解決問題，不能及時揭發與糾正，教育作為政治動家的工作人員具有危害的。

缺乏原則性，沒有布爾什維克批評與自我批評，有時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在庫爾罕省黨委的實例中，可以看得很明顯。該省黨委的前任書記沙拉波夫同志以朋友關係代表了工作中的黨的原則性，省黨委中形成了一種一團和氣，泰然自若的風氣。黨的與蘇維埃的積極份子中間，出現了無紀律性與放蕩散漫的份子，沙拉波夫同志自己已不關心工作，竟有這樣的情形，當農村工作火熱的時候，他却去找自己的朋友和愛人遊逛去了。這樣得到了什麼結果呢？結果是該省許多區裏播種進行得不好，收割與交納糧食的工作也準備得很不好。省黨委的委員們都知道這一切情形，但對省黨委領導者所養成這種非布爾什維克的習性不進行反對，這樣便表明了他們是無原則性的人，是庸人，而非政治的活動家。

無原則性的工作人員其結果往往是失掉獨立性與自性，追求物質享受的工作人員把自己束縛起來，失掉了批評別人的可能性。庫爾罕省黨委的省委有許多的關係上表現了無原則性，就因為他們中間有一些人按着沙拉波夫同志的提議幾度獲得了獎金，這也是他們彼此互相原諒錯誤的原因之一。

無原則性、庸俗化，也是不遵守布爾什維克原則挑選與分配幹部的結果。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要用據政治的標準來挑選幹部——就是說，要看該工作人員在政治上是否可靠的。也要根據業務的標準——就是說，看他是否適於這樣一種具體工作。凡是違反這種原則的地方，凡是挑選幹部祇根據家庭的庸俗的朋友的關係，不管他們政治上和業務上是否適當，那裏便要替吹拍逢迎與在工作中互相包庇缺點，造成有利的條件。得到的不是在原則基礎上的領導核心，「不是負責的領導集團而是親近人民的小家庭，而是這樣一種組合，他的組員都力求和平共居，彼此不相得罪，家醜不可外揚，互相吹噓……」（斯大林）。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談不到對工作人員的高度嚴肅性。在烏梁諾夫斯克有很多事實表現出了嚴重的缺點，比如城市管理無人過問，居民們常常沒燈光，自來水忽有忽無，滿街是髒東西，省委書記德林吉也夫同志對此熟視無睹，對於城市管理失職的罪人表現了自由主義的態度。這一切正因為德林吉也夫以前在遠東工作，當時，他傾身把幾個對於他是「合適」的工作人員帶到烏梁諾夫斯克來，現在他對於這些人的工作也未表現出足夠的客觀態度，而因朋友關係對他們就百般地原諒了。

對幹部進行思想教育，這是我們當前的重大任務。新的幹部不斷的增長起來，必須以布爾什維克的傳統教育他們，發展其優良的性格與品質。高度的原則性與理論性乃是列寧——斯大林式的工作人員之卓越的特點與最重要的品質，以原則性與克服困難的堅決性教育幹部，將會促進更加順利的實現新五年計劃的任務與在我們國家內建設共產主義的任務。（譯自一九四七年九月廿五日新理報）

# 伊里奇論領導權

友谷

無產階級不僅要積極參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應該在這革命中取得領導權，使革命的結果成爲主要是有利於工、農民的民主制度。——這是由列寧第一次提出來的思想。把這個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就是他在一九〇五年所著「社會民主黨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蘇聯共產黨史中說：「貫串於列寧這本書中的基本的策略論點是無產階級應該而且可以成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袖，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領導者的這種思想。」

指導革命的理論必須隨着歷史條件的發展而發展。在十九世紀前期，西歐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由資產階級起領導作用，而無產階級只能居於助手地位，在那時候，馬克斯主義者提出的策略方針也就只能認爲，無產階級應該參與民主革命，但需保持自己的階級要求與政黨組織的獨立性。到了列寧的時代，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列寧才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問題。一般說來，列寧在一九〇五年所提出的基本策略思想是適用於進入帝國主義時期後各後進國家中的民主革命的。但自然並不是說在列寧之後，人們只要複述他所說過的每一句話就夠了。

當前的中國雖和一九〇五年的俄國一樣都處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但具體的歷史條件已和當時的俄國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中國的民主革命中也就產生了種種新的具體問題，並要求新的解決方法，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也會表現爲新的形式。然而可以肯定，中國革命實踐並不是否定了列寧的思想，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了列寧的思想。所以如果我們機械地照抄固然是錯的，但如果以爲我們不可以和應該從列寧學習其所提出的基本策略思想，那也錯了。



本文想對於列寧在「兩個策略」中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思想，說明幾個值得我們注意的要點。

### 一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是資產階級的事業麼？

一九〇五年時的俄國社會形勢決定了當時的革命不能超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這點是布爾雪維克與孟雪維克都同意的。但孟雪維克認爲既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那就是資產階級的事，無產階級只能從旁盡力，不必企圖起什麼作用。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則認定，資產階級雖然要民主革命，但他利於這革命進行得不徹底；而「在某種意義上說來，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無產階級比對於資產階級更爲有利」（頁四五）無產階級要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得愈徹底愈好。——由這兩種看法就自然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策略，一種是機會主義的策略，一種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正確策略。

列寧嚴厲地批評了當時俄國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政治傾向，也就是以「立憲民主黨」爲代表的那種傾向，他們出一個秘密刊物，由司徒盧威主編。列寧的書中用這刊物的名稱而稱之爲「解放派」，又由其政治趨向而稱之爲「君主派自由資產階級」，以與「共和派革命資產階級」相區別。因爲由「解放」雜誌所代表的政治集團雖然也提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相對於沙皇專制制度表示着嚴重的妥協傾向。

列寧指出：「『民主』資產階級把推翻沙皇政府的問題掩蔽了起來。」（頁二）而且他們「力圖嚇倒革命民衆，並引誘他們對沙皇制度讓步。」（頁二三）爲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呢？「他們被私有財產，資本和土地等絆腳繩纏得太緊了，所以不能去作堅決的鬥爭；他們非常需要沙皇

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軍事力量來反對無產階級和農民，所以不能力求消滅沙皇制度。」（頁五二）這時，革命的人民已經起來推翻沙皇制度的鬥爭，而沙皇政府爲了欺騙人民，宣佈要召集國會。於是「自由資產階級」的態度就只是「力謀使沙皇和革命人民達到盡可能和平的妥協，並且要這種妥協使他自己，即資產階級，能獲得最多的政權，而革命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只獲得最少的政權。」（頁一三）

列寧就是這樣尖銳地暴露了一九〇五年的俄國的「自由資產階級」的面目。這樣的「自由資產階級」在革命形勢下盡力迴避革命。「解放派，即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是想用柔和精神，用改良主義方法，用生怕得罪世家、貴族和朝廷的讓步態度，用審慎顧忌而毫不破壞現存制度的辦法，用恭順和氣態度，帶上白色手套……來對付專制制度。」（頁五六）

這時，布爾雪維克已經認定，「全面的民主運動已使武裝起義成爲必要」，因爲客觀形勢已經成熟。這種形勢甚至解放派也不能否認。但是解放派的主編司徒盧威却說，縱然「武裝起義是現時解放鬥爭必不可免的結局」，但仍只能「廣泛宣傳民主綱領，才可造成全面武裝新社會心理條件」。對於這種閃避問題的說法，列寧也給予了迎頭痛擊。他說：「司徒盧威先生迴避必須舉行起義的問題，就暴露了自由資產階級所持政治立場底內幕。第一，資產階級寧願去與專制制度分贓，而不願把它擊潰；第二，資產階級無論如何都想把武裝鬥爭的重担卸到工人身上。這就是司徒盧威所迴避態度底實在意義。這就是他從必須舉行起義的問題迴避到「社會心理」條件，迴避到預先「宣傳」的問題上去的原因。」

照這樣看來，好像列寧是反對武裝鬥爭以外的別的鬥爭方式，甚至反對作宣傳鼓動的了。但不。這裏，列寧提出了「言」和「行」的關係的精闢的辯證觀。他指出，當「公開的羣衆政治發

動」還沒有時候，不能用「任何盲動」來代替，而只應該把「宣傳鼓動」的工作提到首要地位。在那樣的時候，「言也是行」。那是「庸俗的革命主義者」所不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尾巴主義的革命家又不瞭解，在革命時機已經開始，舊的「上層建築」已是破綻百出，替自己創造着新上層建築物的階級和羣衆底公開政治活動已成爲事實，國內戰爭已開始的時候，照舊局限於「言」而不提出轉爲「行」的直接口號，藉「於心理條件」和一般「宣傳」而不肯行動起來，就會是一種毫無生機，死氣沉沉的學究習氣，或者就是叛賣革命和叛變革命」。(頁七〇)

這就是說，自由資產階級儘管自命爲民主革命的領導者，但實際上已經是遠落在羣衆積極性後面的尾巴主義者和說空話者了。這也就是說，實際的形勢表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不能是這樣的「自由資產階級」的事情了。

## 二 把共和派革命資產階級提高到無產階級水準

但列寧決不是由此得到結論，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要無產階級單獨進行，不必和不可能有其他階級力量參加。

「民主革命底資產階級性的表現之一，就是有許多完全以承認私有制度和商品經濟爲立腳點而不能超出這種範圍的社會階級、集團和階層，都爲情勢所迫而承認專制制度和整個農奴制度腐敗不堪，都附和於要求自由了。」(一三一)列寧對於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以外的別的階級力量是一點也不忽視。不但不忽視，而且主張要認「地加以檢討，進行區別，從而決定無產階級政黨的策略方針，這和孟雪維克把民主革命的任務，攏統地推給資產階級是完全不同的。

列寧認爲攏統地說「資產階級民主派」是沒有意義的，必須進行區別，首先就要區別出「君

「主派自由資產階級」與「共和派革命資產階級」（或稱之謂「民主革命共和派資產階級」）。由於當時俄國的社會條件和各階級力量對比形勢，使得資產階級幾乎完全是由右翼的「君主派」所代表，而左翼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尚未形成爲一大的人民政黨」（頁四一）；雖然如此，列寧指出了，「這樣一個黨的成分已經存在着的事實，却是不能抹煞的。列寧堅決認定，無產階級政黨應該使自己的「策略口號」與「共和派革命資產階級」相配合，並且願意他們前進，但決不能遷就資產階級右翼的「君主派」。

這裏就橫着列寧與孟雪維克的兩個策略之間的原則上的區別。「恰巧在必須善於區別共和派革命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君主派自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時候和地方，他們（孟雪維克）竟以談論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爲限」（頁四八）其結果孟雪維克雖自以爲是保持無產階級立場，不去和資產階級「打成一片」，所以讓民主革命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但是實際上他們却使自已不敢提出超過「君主派自由資產階級」的口號。不敢提出積極的口號以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前推進，這樣就使自已墮落了下去。

列寧用這樣銳利的詞鋒向孟雪維克說：「我們與共和派革命資產階級並排行進，但是不和它打成一片；你們却與君主派自由資產階級並排行進，也是不和它打成一片。問題本質就是如此。你們提出的策略口號是與立憲民主黨，即君主派資產階級政黨底口號相合，……你們在事實上就成了解放派的尾巴。我們提出的策略口號是與民主革命共和派資產階級的口號相合，……我們打算不僅領導無產階級，而且領導能同我們並排行進的這個小資產階級。……（你們）不自覺地自行降到了君主派自由資產階級底水準，……（我們）不自覺地把那些只會進行鬥爭而不會去實行妥協的革命民主派分子提到自己的水準。」（頁四〇—四一）

「爲了真正團結一切民主改造社會力量，……就要提出把共和派革命資產階級提到無產階級水準上來的口號，而不要提出一些把無產階級任務降到君主派資產階級水準上去的口號。」（頁九六）——在這一點上，列寧提出的策略是富於高度的原則性的。

列寧曾對濫用「人民」一語，但又指出：「把「人民」分解爲一些「階級」，並不是要先退階級固步自封，局限於狹小境界，……而是要先進階級不致沾染中間階級底半途性，不穩定性，和不堅決性，使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熱情領導全體人民去爲全體人民事業而奮鬥。」（頁二六）——這一個英明的指示是包含着豐富的內容的。

### 三 能領導農民就能領導民主革命

雖然在俄國當時，照列寧的說法，革命民主份子尙未能「形成一個大的人民政黨」，但是這樣的份子是在存在的，而且很多。——列寧說：「這樣的份子在農民中間最多。」（頁四一）

農民羣衆是能夠走向澈底的民主革命的道路上的，農民羣衆是無產階級在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最好的後備軍；必須聯合農民，無產階級能夠領導民主革命而走向勝利。——關於這一切，沒有人能夠比列寧說得更好了。這裏不來一一複述了。

但是對於農民的刀量，社會主義的孟雪維克是不懂得的。

孟雪維克當時提出的策略的基本精神就是不要嚇跑了資產階級。他們以爲，如果把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口號提得過高，就會使資產階級嚇退。以致沙皇專制政府就會推翻不了。這些機會主義者說：「我們的利益是要政府找不到同盟者使它不能分化反對派，使它不能以無產階級而把無產階級置於孤立地位。」（頁六〇引）他們以爲，甚至不應該設想在民主革

命勝利後無產階級參加革命政府，因為如果那樣做，『就會迫使資產階級退出革命事業，因而減弱革命底發展規模』。（頁八八引）

對於機會主義者的這種看法，列寧給了一針見血的批評：『他討論着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可能陷於孤立地位的問題，可是忘記了……忘記了一件「小事情」……忘記了農民！』（頁六一）列寧從歷史上指出一八四八年的德國資產階級『叛賣了農民，即它自己最天然的同盟者』，以致無力反對封建貴族而使革命流產。同樣的，列寧說：『在我們俄國，自由資產階級和解放派先生們也會叛賣農民，就是說，他們會用虛偽的改良來敷衍了事，會在地主和農民決鬥時站到地主方面去。』（頁四三）而能夠澈底幫助農民進行決鬥的就只有無產階級。

資產階級『叛賣農民』，資產階級就失去了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無產階級能夠幫助農民，無產階級就能夠領導起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因此，照列寧說起來，無產階級要領導民主革命澈底進行，就要能做到兩件事：第一，把廣大的農民羣衆領導起來，（把他「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水平」。）第二孤立君主自由派資產階級，使他們的不澈底性不能起作用。而這兩件事其實就是一件事，因為『無產階級要在與不澈底的資產階級民主派鬥爭中不致陷於束手無策的地位，就應當具有充分覺悟，充分實力足以把農民提到革命自覺程度，足以領導農民舉行攻擊。』（頁七五）

由此看來，就可知道，機會主義者說，如果「資產階級退出革命」，「革命底發展規模」就會「減弱」，那實在是最有害不過的想法。所謂「資產階級退出革命」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其「不澈底性」的表現。如果無產階級一心一意只爲了顧全資產階級不致退出，那就只能採取妥協柔順的態度，就不敢和封建制度進行澈底的決戰，於是也就不能領導農民羣衆。其結果，無產階

級就會在「不澈底的資產階級」面前自行陷於「束手無策的地位」。於是革命就會中途失敗，所謂「革命發展底規模」根本談不到了。反之，在廣大農民羣衆已經動員起來時，革命規模就會廣大展開，雖然並不超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却已遠超過君主派資產階級所顯意的程度，但是他們是絕不可能來加以阻止的了。正是在這意義上，列寧堅強地指出：『在事實上，只有當資產階級（君主派資產階級）退出，而農民羣衆以積極革命者資格來同無產階級一起奮鬥時，俄國革命底真正規模才會開始起來；只有那時，才會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可能的那種最廣大的革命發展規模。』（一〇五）

所以機會主義的策略實際上就是叛賣革命，就是「變無產階級爲君主派資產階級的方針」，而在這裏，列寧指出，也就充分暴露了孟雪維克『對於資產階級革命這一名詞的根本謬誤見解』。他們以爲既然叫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資產階級就是最重要的決定力量。向這種機會主義的叛徒，列寧嚴厲地說：『先生們，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們應當不管那個不澈底、自私自利，畏首畏尾的（君主派自由）資產階級，而協同人民去力謀實現革命，完成戰勝沙皇制度；或者是我們不容許這「不管」二字，而唯恐資產階級「退出」，那樣我們就會把無產階級和人民出賣給資產階級，出賣給不澈底、自私自利和畏首畏尾的資產階級。』（頁一〇一）

#### 四 敢不敢勝利？

在這本書裏，列寧提出了「敢不敢取得勝利」的問題。（頁一二）這問題的提法好像很奇怪，然而必要的。孟雪維克的策略以害怕資產階級「退出」爲前提，盡量使革命的果實不歸革命的人民（無產階級與農民），這正表明他們不敢勝利。列寧提出這個問題正是爲了肅清「軟弱

無力」的思想，號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政策應當是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領導全體人民，特別是農民來爲完全自由，爲徹底民主革命，爲共和制度而奮鬥！」並且敢於預見在下一步爲實現社會主義而奮鬥。（頁一一九）

如所週知，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雖沒有成功，但列寧當時的號召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後終於一步步成爲事實了。在俄國革命前十二年列寧的書本中是蘊藏着何等敏銳的遠見，何等堅強的革命勇氣啊。他用這樣萬古不朽的字句寫道：「民衆在其他任何時候，都不如革命時期這樣表現爲新社會底積極創造者。在這樣的時期，人民能夠作出爲市儈漸進主義狹小眼光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奇蹟。但在這樣的時候，須使革命黨底領導者也更廣闊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任務，須使他們的口號始終能發揚羣衆底革命自動性，成爲他們的燈塔，表明出我們的民主理想和社會主義理想底全部偉大與全部光彩 指出達到絕對完全勝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



# 列寧論蘇維埃機關人員應如何工作

伏蒂也娃

編者按：這篇文章是從一九四〇年一月廿一日蘇聯消息報譯出的，我們應好好研究這篇文章，並且用這篇文章中所說的列寧式的工作標準來檢查一下我們自己的工作。我們的每一項工作中，是否存在着潦草拖延，缺乏效率，缺乏紀律性，對羣衆利益缺乏熱情和責任心等官僚主義現象，都會影響甚至決定人民的苦樂禍福和生死。向這種官僚主義作嚴肅的和反覆不斷的鬥爭，以便把我們各方面的工作大大改進一步，是過去一年間和今後的重要目標之一。因此，現在發表和學習這樣一篇文章是有益的和適合時宜的。當然，這篇文章裏所說的某些具體要求，在缺少新式交通工具的農村中，是不能完全實現或者是需要降低標準的，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也必須不把這些作爲藉口來原諒我們工作中的那些並非由此產生和並非不可能克服的一切不良現象。農村中散漫而停滯的小生產制度，乃是官僚主義蔓延的重要基礎和掩護物，這正是我們在農村環境中工作的同人們所應當警惕的，因此，我們應當更加注意地與經常地來進行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應該經常掃地和洗臉，以免這些政治的灰塵和政治的微生物來蒙蔽和侵蝕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肌體。

蘇維埃制度保證我國全體勞動者有最大的可能去參加國家的管理，列寧把這看作是我們國家機關底力量所在，認爲這使我們國家機關底活力有不斷改進的可能。列寧和斯大林所創立的蘇維

埃機關，是爲人民利益服務的，爲鞏固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底威力服務的。

列寧：蘇維埃國家存在的最初日子起，就非常重視改進黨權機關底工作，他力求最大限度、地吸引最廣泛的勞動者階層自覺地參加蘇維埃機關底工作。

列寧非常重視國家監察人民委員會。

一九一九年四月，列寧在給斯大林短札中，講到國家監察人民委員會底改組時，把下列幾項工作提到第一位，作爲改組後國家監察人民委員會底迫切任務。這幾項工作就是：四出調查民間的疾苦，與拖延現象作鬥爭，用革命手段與各種腐敗作鬥爭。

列寧要求我們毅然決然地，迅速地，絲毫不苟地執行蘇維埃政府底法令和指示。

列寧警告說：「最小的非法行爲，對蘇維埃秩序的最小的破壞，已經是一個空子，而爲勞動者底敵人所馬上利用……」

列寧在力求人們遵守革命法律時，嚴厲地同賄賂行爲作鬥爭，他把這種行爲叫作沙皇制度底該咒詛的遺物。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莫斯科人民法庭爲審理幾個受賄者底案件，法庭證明了被告有罪，却判決很輕，列寧對這樣的判決大爲震怒，他在的一封信中寫道：

「不把受賄者鎗斃而給了這樣開玩笑似的軟弱而輕微的判決，這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乃是可恥的行爲。這類受賄的同志必須交給輿論裁判，並開除出黨……」。

過了幾天，列寧寫信給司法人民委員，在信上他建議道：「立刻趕快提出一個法案，規定對於賄賂（收賄，贈賄以及其他賄賂行爲等等）的懲罰應該至少是十年監禁和十年苦役」。

列寧再三力求國家機關底精簡，要求工作上的巨大效率，並且堅決同那些以冷淡的拖延態度

來代表法理的工作作風的官僚主義者作鬥爭。

爲了要大家不僅在牽涉國家利益的場合下而且在牽涉個人利益的場合下都嚴格遵守革命的秩序和法令，列寧曾進行了有系統的頑強的鬥爭。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他寫信給人民委員會管理處中說：

「我命令你立即把人民委員會管理處所收到的一切對政府機關及人員的控訴報告給我，其中書面的控訴限於廿四小時內報告，口頭的控訴則限於四十八小時內報告。」

管理處對這些控訴應有特別的登記，同時對管理處辦公室主任應給以縝密的監督，以執行我對這些控訴的決定」。

檢查執行（檢查實際上所做的事情）及善於挑選人員，這是蘇維埃國家機關在工作上勝利的基本條件。

列寧認爲，確切地劃定各個工作人員的職責，確定「每個担任蘇維埃任何職務的人爲執行一定的明白而不含糊地擺在他面前的任務和實際工作所應有的明確責任」，是正確組織蘇維埃國家機關工作的基本條件之一。

不論對機關也好，對個別工作人員也好，列寧始終要求獨立和負責的工作，以尖銳地斥責那種對工作無能和不願負責的現象，凡是個別工作人員及機關企圖把自己本來可以獨立解決的問題提交給人民委員會或聯邦勞動國防會議去解決，他都堅決地與之作鬥爭。

列寧向機關及個別工作人員一再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之一，是要把每件事做到底，做到有實際的結果。

他再三教訓我們，要求完成所委托的工作而奮鬥，教訓我們不要停留在困難面前，不要援引

阻礙順利工作的表面上的理由。他說，必須善於成十次地修正、成十次地重作，但是無論如何要達到自己的目的，開始作碰了壁，那就重新再來過，這樣一直到達到目的爲止——列寧這樣教育我們。

他尖銳地斥責和嘲笑懶惰、粗枝大葉、對工作隨便、對世上一切都喜歡沾一手而又一事無成。

列寧向大家要求工作上的精確性、組織性和紀律性，他以自己的例子表現了高度勞動信譽底最好模範，表現了善於正確地配備工作，善於支配自己工作時間的本領。

誰也不像他那樣懂得時間的寶貴，並善於珍惜它，列寧沒有一分鐘是白白過去的，他從沒有表現過急躁，但他也沒有拖延過，早晨他總在一定的時刻來到接見客人，主持會議，閱讀報告，並依據它們作指示，寫文章，指導當前進行的工作，而總是在正四點時回家吃飯和休息，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晚六點或五點半總是充滿着精力和創造的積極性一直工作到深夜。

列寧不僅善於珍惜自己的時間，而且也善於珍惜別人的時間。列寧領導下的會議不管到會者有多少人，總是準時開會，人民委員會及聯邦勞動國防會議遲到委員底姓名，按照列寧底吩咐都登上了記錄簿，並且註明誰遲到了幾分鐘，如果無故一再遲到，列寧就斥責遲到者，警告說，再犯就登報。

列寧從不使那些在指定時間來見他的人們等候，他在稀有的場合下當他同其他先來的工作人員談論工作而不得不延遲幾分鐘時，他就在指定的時間把祕書叫來，要他去向等候的同志們道歉，請稍微等一下。

有一次，在人民委員會開會的時間，列寧偶然經過彙報人的房間，看見整個房間塞滿了疲倦

的人們，他們坐在「霧迷濛中，有些在下棋，有些在看報，等着叫到會上去。

列寧馬上對秘書作了一系列具體的指示，要他們排好召集黨報人的次序。不僅如此，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他給人民委員會管理處長一個書面的指示，要他週密地排好一個召集黨報人的次序。他寫道：

「現在黨報人一般總要等幾個鐘頭才被召集與會。

這是醜惡和野蠻。

必須做到使黨報人在一個一定的鐘點被召集」。

列寧所主持的人民委員會及聯邦勞動國防會議的會議，都是在標本式的肅靜和全體出席者聚精神之下進行的，這些會議，對於蘇維埃機關、實際領導者乃是真正的政治教育學校。

列寧在主持人民委員會及聯邦勞動國防會議的這些會議時，總是盡力使討論簡短，使發言者講話明白而且扼要，會議上的長篇大論，列寧認為是無謂的浪費時間。

列寧也批評和責難長篇的書面報告。

對於這樣的報告，列寧平常是從後邊、從實際的建議看起來，如果發現這些建議是實事求是的，他才把整個報告看完。

不管他所擔負的國家事業多麼巨大，列寧總找得出時間和精力來解決簡單的和細小的問題。

斯大林同志在列寧逝世第一週年紀念日發表於「工人報」的一封信上，指出了列寧底這個卓絕的特點，他寫道：「從來也不拒絕細小的工作，因為小事是大事的根——這就是列寧重要遺訓之一」。

列寧把他自己的指示要求，個人例子同工作上的有修養的習慣和態度結合在一起，他慣於實

事求是地和獨立地解決問題，慣於對所執行的工作負責，慣於把政府所通過的決議與法令確切和恰當地付諸實施，同時在蘇維埃政權機關中，樹立起革命的紀律和秩序，他耐心而又頑強地鍛鍊了一批新的國家工作人員。

列寧在其寫於重病時期（一九二三年一月間）的最後兩篇文章裏，再度專門論述創立模範的國家機關的問題。列寧在「寧缺毋濫」這篇文章裏指示道：

「我們無論如何，要向自己提出革新我們國家機關的任務：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是學習，然後就來檢查，使得科學在我們這裏不再是死板的教條和時髦的漂亮話（用不着掩飾，它在我們這裏却常常是如此），使得科學實際地化爲血肉完全而且真正地變成生活底組成因素」。

自從列寧寫下這些卓絕的話句之後，已經過去二十餘年了，我們偉大祖國底國家機關在這個期間是大大地增加了，它的工作範圍是更加複雜了，更加艱鉅了，更加多種多樣了。

蘇維埃機關勝利地執行了它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時期中所擔負的各項任務。

我們的國家機關，在反對德國侵略者的偉大愛國戰爭時期，表現了特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和效率。我們各個經濟的和行政的人民委員會，以及我們全部國家機關，在戰爭日子裏，進行了鉅大而又困難的組織工作，並且保證了紅軍爲粉碎敵人所需要的一切。

現在，在愛國戰爭勝利結束以後，在新的和平建設時期，我們國家面前出現了新的巨大的任務，這就對我們全部國家機關底工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莫洛托夫同志說：

「我們沒有比鞏固我們的勝利更爲重要的任務了，這個勝利是我們在不屈不撓的鬥爭中所取

得的，這個勝利爲我們國家新的偉大的繁盛、爲我國人民生活水平之進一步提高開闢了道路，在我們面前展示社會主義建設，如此規模宏偉的遠望，以及蘇聯力量如此巨大增漲的可能性，過去從來還不曾有過」。爲了執行這些任務，需要進一步改進蘇維埃機關底工作，使得它在新的和平條件下也工作得「像一個好的時鐘一樣合拍而且準確」。〔齊生譯曹葆華校〕

# 檢查決議的執行程度是領導的基本方法

蘇聯真理報社論

正確的政策是勝利的源泉，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這並不等於勝利的本身。勝利不是自己會來到的，必須加以組織，加以爭取。

斯大林同志對於政策路線與組織工作的相互關係，作出了典型的定義。他說：「在制定正確的路綫之後，對問題已作出正確的決議之後，事情的成敗即決定組織工作、人員的正確選擇以及對各個領導機關執行程度的檢查。否則，黨的正確路線與決議即會遭受嚴重的損害。不僅如此，在制定正確的政策路線之後，組織工作即將決定一切，就是政策路線本身的命運——成功或失敗——亦不例外」。

布爾塞維克政策之所以能獲得連續的勝利，是因為黨經常以全部力量進行組織工作，以保證自己政策路線之實現。我們的黨正在進行着艱巨的工作且動員廣大人民羣衆完成共產主義建設的歷史任務。

列寧與斯大林教導我們：在組織工作中最主要的是選擇幹部與檢查執行程度。黨的組織只要遵守這一指示，就可以使布爾什維克的領導方法在我國偉大建設的各方面都獲得進益。

目前所進行的黨的代表會議指出；黨的組織爲了提高戰後時期的經濟與文化，正在進行着熱



烈的與全面的工作，發揮蘇維埃人民的偉大力量，他們的積極性與克服困難的堅定精神。黨的組織在全國人民中發起社會主義競賽。爭取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完成，在聯共黨中央對文學與藝術問題的決議頒佈後，各地組織即更加注意於思想教育工作。許多黨組織都積累了對羣衆宣傳鼓動的豐富的經驗，黨的幹部強固的掌握着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藝術，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論水平。

但是，許多次的代表會議也指出了黨組織在黨領導工作方法上存在的嚴重的缺點。仍然有這樣的工作人員，他們只注意於開會，準備決議與製成決議。而在決議一經製成之後，他們往往就會把這些決議忘得一乾二淨。製成的決議在實踐中會怎樣，所能實現的程度如何，是否所有的機構都已行動起來，遇到何種困難，需要採取何種補充措施以保證事情的順利進行——對於所有這些都不給以應有的注意。例如，乞下法夫州的黨代表會議指出：州黨委與某些區黨委減弱了對自已決議的執行程度的檢查。州黨委與區黨委對於決議的執行只倚靠着自己小團體的活動，未能發動黨的幹部與蘇維埃的積極分子和勞動羣衆積極參加工作。在萬分不得已時方派遣全權代表的辦法，在這裏已成爲領導上的主要手段。日常的細密的羣衆工作，對幹部的領導等時常是被無數決議的傳達與電報的拍發取而代之一。

這樣的領導方法曾造成一種錯誤，即是：黨委會如能製成大量的決議，向各地發出許多電報，就是能表明它在工作中確實有足夠的緊張。但實際上，黨的機關正是因爲忙於這些工作而使自己不能廣泛並全面的推動事情的進程。這樣，也就不能充分發揮現有的提高全部工作的可能性。

布爾塞維克的領導原則要求：在製成決議之後即須計劃並製成方案以保證這一決議的執行。在一種情形下，需要派出一個或一組有經驗的工作人員至各地去。在另一種情形下，則必須給以物質技術器材的援助。總而言之，組織決議的執行，這就是說要發動黨與蘇維埃的無數幹部積極工

作，由他們領導廣大人民克服困難，保證以布爾塞維克的工作速度完成國家當前的任務。與幹部們一起工作，給他們實際的幫助，指導他們，這是檢查的主要方面。黨委會的責任在於使工作人員們明白他們所執行的任務的實質，使他們了解（電碼漏五字）用以更好的執行決議，最好是選擇何種組織形式方能增加黨發動羣衆的力量，保證黨組織當前任務的解決。

檢查執行程度是黨組織手段中最有效的武器。但必須嚴格遵守下述數點：

第一、對執行程度的檢查必須是有系統的，而不是插曲式的，就是說，在製成決議之後，不遲疑，不等待，立即督促決議的執行。了解該組織的日常生活，惟有如此，它才能隨時隨地過問並在必要時糾正工作。這樣，對執行程度的檢查方能隨時隨地發現工作中某一段落的混亂並及時找出造成混亂的責任者。只有隨時並有系統的檢查執行程度，方能預防錯誤和缺點；也只有如此，黨委會方能適時的幫助自己的地方組織。檢查執行程度乃是黨組織以布爾塞維克責任心與紀律性教育幹部的有力武器。

第二、檢查執行程度不應該由次要的工作人員負責，而應該由領導人親自動手。列寧曾要求各組織，各機關的領導人必須將自己領導下的有經驗的，得力的工作人員「控制在自己手內，用以檢查實際工作之進行」，委託「某某人，到那裏去，視察，檢查，如果事情出漏洞就要你負責」。斯大林同志曾指示過：領導人親自檢查工作是能夠使工作檢查發生效力的最重要條件之一。

第三、檢查執行程度應該不只是根據形式的報告，而首先應在工作地點，根據工作的實際效果檢查之。

第四、檢查執行程度必須是客觀的，嚴格的。惟有展開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方能及

時揭露缺點並製定糾正缺點的方法。檢查執行程度時對一切問題的解決不能舞弊徇私。那裏發展這種非布爾塞維克的風氣，那裏就會產生不負責任的情形，跟蹤而來的就是對國家利益的漠不關心與不忠實。對着缺點應該不是掩飾，要展開尖銳的布爾塞維克的批評，不是寬容，要用非常嚴格的态度對待它——這是使檢查執行程度收效的一個重要條件。

檢查執行程度是布爾塞維克領導的基本方法。檢查執行程度的結果可以反映出黨委會的全部領導作風，組織黨的積極分子，全體共產黨員，廣大勞動羣衆參加工作的能力。如果要加強對工作的督促與檢查，就必須改進全部的領導工作方法。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工作的檢查如能組織良好，就會像探照燈似的，隨時隨地照明一個部門的工作情況，使官僚主義者與事務主義者暴露自己的原形。可以肯定的說：我們工作中十分之九的缺陷與漏洞都是由於缺乏組織良好的工作檢查而來。無疑問的，如果有正確的工作檢查，工作中的缺陷和漏洞大都可以避免的」。

黨組織的責任是對於決議執行程度的檢查工作加以積極的改進。而決議的本身則應確實符合蘇維埃人民爲執行其所擔負的偉大任務的要求。這就是我國經濟，文化生活與共產主義事業建設各方面的新勝利的前提。（常彥卿譯自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七日蘇聯真理報）